

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

朱鸿林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摘要:刘基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寓言体裁之作《郁离子》、科举经义体裁的《春秋明经》、《拟连珠》以及八题一〇七首被吕立汉称之为“议政诗”的诗歌。《郁离子》作于刘基四十九岁出仕明太祖之前一年,是近代论述刘基政治思想的主要甚至唯一根据,相关研究已经很多。“议政诗”作于元末明初,主要是入明之前作品,近年有吕立汉的专文研究。《春秋明经》四十一篇的著作年代颇有争议,但其断定对于了解刘基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是必需的。文章从此书的文本分析结合刘基的传记、元朝的科举制度进行考究,检讨了既有的各种说法,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此书不是刘基早年练习举业之作,也不是明初之作,而是至正八年至十一年八月间,刘基任职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时,为儒学生员讲说文义而写成的,具有应试范文集的性质。

关键词:刘基;《春秋明经》;《春秋》研究;元代科举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672-0105(2006)-04-0004-09

Decade Issues on Liu Ji's *Chun Qiu Ming Jing*

Zhu Hongli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Liu Ji's political ideas are illustrated in *Yu li Zi*, *Chun Qiu Ming Jing*, *Ni Lian Zhu* as well as *Discussing-politics Poems* (named by Lv lihang). *Yu li Zi* is the only ground for discussing Liu Ji's political ideas written in his forty-nine, while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about it. *Discussing-politics Poems* mainly consisted of works before Ming dynasty was written between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while; recently, study about Lv Lihang has been appeared. There are many debates on decade issues about Liu Ji's *Chun Qiu Ming Jing*, but it is necessary to infer the definite decade of it and good at the development of Liu Ji's thoughts. By Liu Ji's biograph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Yuan dynast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new opinion that *Chun Qiu Ming Jing* is teaching material for text examples when Liu Ji did as a supervisor instead of Liu Ji's early works or others.

Key words: Liu Ji; *Chun Qiu Ming Jing*; *Chun Qiu* research; Imperial examination

刘基被明代中期的官方评价为“开国文臣第一”。^① 他的政治思想在明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著中是必见的,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著中也属常见。刘基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几部著作。它们是寓言体裁的《郁离子》、科举经义体裁的《春秋明经》、《拟连珠》以及八题一〇七首被吕立汉称之为“议政

收稿日期: 2006-08-29

作者简介: 朱鸿林(1950-),男,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刘基《诚意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四库全书》本)卷二十,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资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臣詹徽宣奉赠谥太师文成诔》。

诗”的诗歌。^①《郁离子》作于刘基四十九岁出仕明太祖之前一年，是近代论述刘基政治思想的主要甚至唯一根据，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②“议政诗”作于元末明初，主要是入明之前作品，近年有吕立汉的专文研究。^③《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颇有争议，但其断定对于了解刘基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是必需的。本文从此书的文本分析结合刘基的传记进行考究，提出新的看法。

二

《春秋明经》共有四十一篇，最晚在明宣德五年（1430）之前已经厘定，成化六年（1470）之前已有四卷本刊行。现存最早的刘基诗文合集本、成化六年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和最早收入此书的刘基诗文类编本、隆庆六年（1572）刻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均作二卷。^④当代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不及对《郁离子》的多，但也有足够数量可以反映书中刘基思想被重视之处。王云五的《明代政治思想》抄录了此书五篇，以展示刘基关于“财经问题”以及“对于国与国间及汉族与边疆民族间的关系”的思想。^⑤侯外庐等的《宋明理学史》有专节讨论，除了在“夷夏”问题上探讨刘基的民族观点之外，更多的从“天人感应”问题上论析刘基的气的哲学和理学思想。^⑥孙广德的长文《刘基的政治思想》，在讨论“天人关系”、“华夷之辨”、“民本主义”、“对外关系”、“君论与臣论”等方面，征引了此书十篇十三次之多。^⑦周群在所著《刘基评传》中的《重民攘夷的政治伦理思想》专章中，也征引了《春秋明经》中的八篇文句，用以讨论刘基“以德养民的民本论”、“以道事君的君臣论”、“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忠孝观念的探索与失误”和“仕元佐明之变的思想动因”。^⑧后来也以《春秋明经》为据，再论析刘基儒学思想中的“感应论”以及评论当中所见的刘基政治思想。^⑨这些论著如果能有此书的确定著作年代作为立论参照时，刘基思想的时代意义及其指涉对象应该更加清楚。

《春秋明经》之所以不易决定其著作年代，主要原因是缺乏直接的说明文字。此书未见刘基或其同时人物所作序跋，刘基自己没有论及它的文字留存，刘基最早期的传记、黄伯生撰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也没有在胪列刘基的“遗文”时提及它。但黄伯生所撰的《行状》有这样描述刘基早年为学表现的说话：“年十四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⑩据此，历来便将《春秋明经》看作刘基年轻习举时代的作品。这样，此书对于了解刘基的成熟思想，重要性便相对地减低不少。

① 吕立汉《论刘基以诗议政的创作倾向》，《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22卷第1期〔2000年2月〕，第22-26页。

② 举例而言，早年而具洞见的，有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华冈出版社，1977年），第529-535页（第十六章第一节）；陈大络《刘伯温思想的渊藪》，《艺文志》第一五七期（1978年10月），第24-34页；近年有郝兆矩《略论刘基的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28-35页；吕立汉《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治国方略》，《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0-24页。

③ 吕立汉《论刘基以诗议政的创作倾向》，第22-26页。

④ 吕立汉《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86-98页，尤其第90-91页。

⑤ 王云五《明代政治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2-28页。

⑥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93页。

⑦ 孙广德《刘基的政治思想》，台湾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第四十期（1992年），第1-49页。此文完整收入氏着《明清政治思想论集〔上〕》（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63页。

⑧ 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5-216页。

⑨ 周群《刘基儒学思想刍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4年6月），第6-18页，尤其第13-16页。

⑩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二十。

容

迄今为止,关于《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1)容肇祖、郝兆矩、吕立汉等认为它是刘基早年习举应考时之作,(2)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认为作于刘基元末辞官隐居浙东之时〔亦即《郁离子》同时期之作〕,(3)周群认为它萌于元末习举之时而写定于明朝初年,(4)杨讷认为它作于刘基元末投赴应天前。这些说法颇有递相辩难的情形,依照它们出现的次序来看各家成说的观察角度和依据,有助于我们判断究竟。

首先是,容肇祖在1980年代认为“《春秋明经》是刘基二十二岁中进士以前准备应考的著作。”^①《宋明理学史》不以为然。其理由是,在此书之中,“刘基对《春秋》大事的选取和义理的论说,以及文字的凝练,表明它并非少年习作。其中所论气的感应和鬼神论,与他成年之作《郁离子》,不仅文风近似,其思想也相互通贯。如果是少年习作,不成熟的文字,则数经选辑重刻的《文集》,是断乎不会一再选进去的。”还有的理由是,“《春秋明经》中谈‘华夷峻防’、‘胡主中国’,其排夷、仇夷思想是公开‘形于篇什’,这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代,刘基是不会轻于惹祸写这种有禁忌的文字的。”^②

使

到了1990年代,郝兆矩认为,《春秋明经》有明显的天人感应思想,与刘基“后期思想相悖,显见《春秋明经》乃早年著作。”^③周群则据正德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凡例》所言,以及该本的编次,认为此书“显然不是刘基早年的作品。”^④更明确地说,则“《春秋明经》当初萌于元末习举之时,写定于明初。”^⑤对此,吕立汉认为,说刘基文集的编次是“以〔各集原来成书之〕时之先后为序”,不足为据。^⑥他认为郝兆矩之说合理,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他以刘基会试的应试文《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试题为《荆人来聘时楚屈完来盟于师时楚时宜申来献时楚使椒来聘》),和《春秋明经》“诸篇逐一比较,发现两者在拟题、格式、文风等方面皆类似。其中《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子使椒来聘》一文,其拟题与会试题目部份相合;《郑人侵宋……同盟于幽》与会试所作之文关系密切,会试时多有套用,笔法酷似。又,是集诸篇皆在八百字左右,最短亦不短于五百字。元科举程序规定:经义一道,字数限五百字以上(《元典章》卷三十一),可见篇篇中式。凡此种种,皆说明《春秋明经》乃刘基早年习举业之作也。”^⑦吕立汉又从刘基应会试而作的《至顺癸酉会试龙虎台赋》的文学成就,有意无意地为此说提出了旁证。刘基此文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以场屋之作为世所传诵者,百中不一二也”之作。吕立汉说:“会试之前,刘基‘未获睹斯台之壮观’,仅凭其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就把‘魁群山而独尊’的龙虎台壮观之势描绘得气象万千,足见其对此文体的训练有素。”^⑧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道理来看,那么刘基对于《春秋》经义也可以是训练有素的,二十三岁应试时,便实有可能来写出像《春秋明经》这样的文字。

① 容肇祖《刘基》,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四。转引自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② 《宋明理学史》下卷,第87-88页。

③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页。转引自吕立汉《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第90页。

④ 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9页。亦见吕立汉《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第91页。

⑤ 周群《刘基评传》,第156页。亦见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10页。

⑥ 吕立汉《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第91页。

⑦ 吕立汉《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第91页。

⑧ 吕立汉《千古人豪——刘基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对于容肇祖、《宋明理学史》和周群等的三种说法，杨讷最近的研究提出了异议。杨讷认为《宋明理学史》之说不能成立，“因为《春秋明经》里根本没有〔《宋明理学史》所引的〕“胡主中国”四个字，”而其它的有关“华夷”之辨之说，不足以构成“惹祸”的问题。但《春秋明经》的文字，确较刘基早年应试作的《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的“洗练多了，识见也广而且深，不是当年参加会试的水平能及。”所以在他“看来，《春秋明经》写于元末，是在刘基思想、文字成熟以后，投赴应天之前。”^①杨讷此说和《宋明理学史》的差别在于，《宋明理学史》将著书时间限定在至正十九年（1359）“春夏之交”刘基弃官离开石抹宜孙幕府，^②至至正二十年三月刘基应明太祖之召到金陵之间的一年，杨讷则可以倒推十年甚至二十年。周群“写定于明初”说的时间跨度很大，可以有三十年之长，杨讷认为此说缺乏证据，难以接受。^③

以上诸说，各有难以说服对方之处。《宋明理学史》论证《春秋明经》不是刘基少年习作所举的“对《春秋》大事的选取和义理的论说，以及文字的凝练”的三个理由之中，“文字的凝练”理由，便因吕立汉所引的刘基应试文《至顺癸酉会试龙虎台赋》的文字造詣而产生困难。选事构题和义理立论两点，诚然重要，但《宋明理学史》没有提出论证，故此只能算是意见。《宋明理学史》提出的政治禁忌考虑，也值得考虑，但正如杨讷所指出的，此书所说的“华夷之辨”实不足以构成“惹祸”。这是因为到了元代，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是《春秋》学以及科举《春秋》一经的传统命题。元朝政府在科举用书上既然已经采用宋儒胡安国的《春秋传》，根据《胡传》的明经之作，便不构成问题。而且，也如杨讷所着重指出的，此书的“华夷之辨”也没有仇夷排夷之类的论调。我们应该考虑的还有：第一，元朝科举的命题和阅卷官员，主要都是“华人”，《春秋》经说的传统他们是知道的。他们能够出像刘基会试时那样集中发明“荆楚”问题的《春秋》义问题，就表示他们已经考虑到“华夷”问题的议论不在“忌讳”之类。第二，刘基此书关于“华夷之辨”的问题，其实重点不是所谓的“民族”、“种族”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问题，一个已有传统的“华夷文野”之分的问题。《宋明理学史》又说此书“其中所论气的感应和鬼神论，与他成年之作《郁离子》，不仅文风近似，其思想也相互通贯。”这样的说法却难免有这样的问題：即使是近似，也只是一个命题上的相似，不是全部的相似。但此书明显的命题却有多个，而且整体上看，文字风格并不见得与《郁离子》的接近。

郝兆矩从《春秋明经》“有明显的天人感应思想”而《郁离子》没有来判断“《春秋明经》乃早年著作”的说法，只能是比较《郁离子》的著作年代而言。《郁离子》在刘基的从政年代来说，切当的说是“中期”而不是“晚期”。《郁离子》完成后刘基便跟从了明太祖，此书去其卒年还有十五年，距离明朝开国也有八九年。如果按照这样说法，周群也可以说此书与《郁离子》思想相悖而是晚年之作。

吕立汉所说的刘基应试文《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和《春秋明经》诸篇“在拟题、格式、文风等方面皆类似，”也没有足够的举证。就“拟题”而言，由于元朝科举并不止于刘基应试的该科，因而即使

① ③ 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10页。

② 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59页。

④ 《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文长1277字，其题目为《荆人东聘/时楚屈完来盟于师/时楚使宜申来献捷/时楚使椒来聘》。破题说此篇题旨是“春秋时，中国之安于陋者，〔圣人〕嘉其慕义而罪其猾夏。”而圣人作经之意，“所以与人之为善，而德人之怙恶也。”刘基的答卷的说经取向，或者说作答的技巧所在，便是集中解说圣人对于楚国施行与夺和奖惩的“书法”。他从“书法”来明经义，通篇一贯，只是说明圣人与之夺之之故。

偶有相似，也不等于《春秋明经》诸篇都是一时之作和早年之作。就“文风”而言，会试答卷与《春秋明经》所见的，其实基本不似。刘基应试经义全篇只用“书法”论析，尤其显著。^①就“格式”而言，此书诸篇有明显的类别异同，因此更加不能一概而论。会试经义题和此书《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子使椒来聘》篇题目有“部分相合”，但相合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两篇此节的论说内容也不相同。说到《郑人侵宋……同盟于幽》一篇（第12篇）“与会试所作之文关系密切，会试时多有套用，笔法酷似，”所谓“关系”，不知何指；“套用”和“笔法酷似”，也都看不出。而且，正如上面所说，会试不止于一科，如果内容果有类似或相同，那固然可以是早年之作，但也可以是晚年之作。至于篇篇都是五百字以上，符合科举要求，那只能反映此书必与科举有关，却与是否早年习举之作毫无关系。

三

以上四说，除了早年习举应试说可以不言而喻之外，没有谈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刘基的预期读者问题。《郁离子》是写给待兴的王者看的（《郁离子·九难》篇末），《春秋明经》写给谁看的呢？因为不问这个问题，所以也没有充份理会此书所有四十一篇的体裁和结构情形。这其实却是考虑此书著作年代的关键因素。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须知道元代科举的试文要求。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所载，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颁布的科举“考试程序”是：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统癸酉科……稍异其制。……后三年，其制遂罢。又七年（即至正元年）而复兴，遂稍变程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易汉、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①

《元史》所载对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的主要讯息，是至正元年（1341）改变程序之事。此事《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元人黄复祖撰《春秋经疑问对》提要条给了重要左证。提要说：

复祖序云：至正辛巳（1341）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畧，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举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踈焉。”^②

根据这两处信息，我们首先知道，本经之考“经疑”始于至正元年。其次是，“经义”字数较经疑字数多。再次是，经疑颇采“属词比事”之法设问和作答。

《春秋明经》顾名思义与科举的“明经”部分有关。从其字数和体裁两方面看，《春秋明经》诸篇中有明显的经疑体裁。这样，此书的著作年代，便不能早于本经也考经疑的年代。换言之，到了刘基应试的至顺癸酉科（至顺四年，1333；该年后来顺帝即位，改元元统，故此也称为元统科），《春秋》还只是考经义的，到了刘基登科八年后的至正辛巳（元年、1341）科，《春秋》才变成既考“经义”也考

①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2026页。

② 永瑆、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四库全书》本）卷三十，《春秋经疑问对》（据《永乐大典》本）二卷。

“经疑”，试文因此也有了两种不同要求的体裁。刘基习举应试时，习的只是经义体裁的文字。《春秋明经》两种体裁都有，这便足以证明它不是早年习举之作，而是至正元年以后之作。但因此书总是为科举而写的，所以可能被认为属于“议论多而义理则疎”之类而少被论及。

以上所论，从《春秋明经》诸篇结构的具体分析可以获得证示。此书结构明显地有两类之别。一类是全篇对比整齐，有明显的四对八比结构，至少也有六比，并且是段落性的对比。另一类是篇中只有偶见的段落性对比，甚至全无对偶句子可见的。两模拟较之下，有严整对比的篇数较少，只有6篇，而每篇的字数一般较多，字数最多的一篇（984字）也在此类之中。^① 偶有对比和没有对比的篇数多，而每篇一般字数较少，字数最少的一篇（555字）也在此类之中。^② 有比较意义的《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共有1277字。本文选录三篇附载正文之后，可以见到这两类篇章结构上的不同之处。这两类结构不同的单篇，我看是代表了元朝后期科举考试“明经”部分的“经义”和“经疑”这两种体裁。这两种体裁同时出现在《春秋明经》一书之中，便说明了此书只能出现在“经疑”成为《春秋》考试体裁之后。

从这个判断上考虑，我们应该注意黄伯生撰《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中说刘基“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这句说话。根据杨讷的考证，刘基至正八年（1348）“以儒学副提举职移局杭州，”直到“大约在十一年八月他因病辞去了”职务。^③ 我看，《春秋明经》就是这段时期之内，刘基在江浙儒学副提举这个职务上，为儒学生员写成的，具有应试范文集的性质。刘基此时有需要写此书吗？答案是肯定的。《元史》载：“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④ 儒学提举主要是管学校和考试的行政工作，但认真的提举也会“与诸生讲说文义。”^⑤ 若说《春秋明经》是源于这种讲习的需要而作，或者还不至于勉强。

这里需要再考虑的，是周群提出的明初写定之说。周群虽然没有为此说提出任何根据，但《明史》所说的刘基与明代科举制度制定的关系，可能是他的思考的来源所在。《明史·选举志》说：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⑥

科举之制既然由刘基参与制定，假设刘基撰《春秋明经》作为给考生研习的范文，也可以是情理中

① 这六篇（及其字数）是第1（984，字数最多）、3*（875）、11（685）、24（677）、32（678）、33（747），*号表示该篇的字句对比细密度稍逊。

② 只有偶见的段落性对比的是第2、4、5、6、8、12、15、16、18、29、35各篇。全无对偶句子可见的有第9、10、13、14、17、19、20、21、22、23、25、26、27、28、30、31、34、36、37、38、39、40、41各篇。《春秋明经》四十一篇中，字数最多的是第1篇，共984字，最少的是第20篇，只有555字。以数字计算，600字内的有5篇，700字内的有13篇，800字内的有16篇，900字内的有5篇，900字以上的有两篇。少于600字的，属于只有偶见段落性对比的各篇的有第6（566）、18（570）两篇；属于全无对偶句子可见的各篇有第14（576）、20（555）、27（586）各篇。

③ 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19页。

④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第2312页。

⑤ 贡奎便是例子。事见马祖常《石田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四库全书》本）卷十一，《集贤直学士贡文靖公神道碑铭》。

⑥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七十，《选举二》。

这也即是所谓“属词比事，而义自见”之意。意思是以同类事情相从比看而见当下事情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举一例子以明此意。《春秋胡传考误》中《夏齐人取讙及阚归邾子益于邾》条说：

（哀公八年）传云：“《春秋》隐君之恶，此何以备书于册而不讳乎？圣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恶，务去之而不积也，则不念其恶而进之矣。以邾子益来，恶也；归邾子益于邾，是知其为恶，能去之而不积也。故书以邾子来而不讳者，欲见后书归邾子之为能去其恶而与之也。”此迂曲之论也。《春秋》惟隐君之恶，故灭邾不书灭而书入。处其官，昼夜掠，执其君，献于亳社，囚于负瑕，此恶之极也。不书执其君而书以邾子益来，所谓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实者也。按，邾子益齐出也，齐人为是取讙及阚，而复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是为有所畏而归之乎？抑果仗义而归之乎？以为能去其恶而与之，谬矣。属词比事，春秋教也。上书齐人取讙及阚，而下书归邾子益于邾，比事以观，而鲁人畏强凌弱之罪见矣。^①

这便是以类相从、按时先后来看事情原委的“属词比事”之法。

刘基在《春秋明经》书中，也主要用的是“属词比事《春秋》之教”这个经典原则来探究《春秋》旨意和发明《春秋》经义的。书中很多篇是根据这个原则来拟题的。我们要注意的，如果这些题目是拟给他自己练习应试的，那此书诸题反映的便是当时可能出的题目。如果是拟给别人学习应试的，那刘基便作的是借题为教的工夫，教人怎样学习《春秋》之法，而此书各篇也是明显的借题发挥，借经说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按，此书不是《郁离子》般的“借古喻今”之作，而是“借经明义”之作，故此说“主张”的少而说“见解”的多。）作为举业用书，《春秋明经》教的可以说是“授业”和“传道”之事。授业是讲的“属词比事”的分析、推理方法；传道便是说的自己的观点、主张。^②

五

最后可以提及的是书中所见的所谓夷夏问题。刘基是否狭隘汉民族主义者，和判断此书的著作年代诚然可以有关。如果刘基不是狭隘汉民族主义者，那么此书作于元代便更毫无问题。刘基无疑认为《春秋》重视礼义（文化、价值），并以之作为华夷或夷夏的辨别标准的。《春秋明经》涉及夷夏问题的至少有九篇，与这个辨别有关的便有六篇。这六篇中，“内夏外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但重点却只是华夷为礼义之有无的代表：有礼义是为华，无礼义便是夷。

最能见到刘基这种夷夏之辨态度的，是《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子使椒来聘》（第31）篇。此篇发明文公九年三月和冬天发生的两件事情的意义。刘基认为，“尝谓夷狄猾夏未足忧，而中国之衰为可忧。”而诸侯救郑之役，“实华夷盛衰之大机也，”从此中国衰而不振。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晋灵少懦，不在诸侯，楚人师于狼渊以伐郑，是以此尝晋之能否也。晋大夫以五国之师救郑，而缓不及事，《春秋》贬大夫而人之，以见中国之不振自此始欤！由是楚势遂张，而使椒聘鲁，乃以爵书，而君臣并见，然后华夷无复辨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之所以会“华夷无复辨矣，”是“越椒来聘，

①（明）袁仁《春秋胡传考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四库全书》本），哀公八年《夏，齐人取讙及阚，归邾子益于邾》条。

②《春秋明经》明的是“经文”，但论析所根据的除了全书的经文本身之外，还有传记。此书所据的传记疏，刘基一般不说，但其实三传和胡传都用，反映了他依照了元朝科举的要求。此外，他还有意思和张洽传相同的地方，虽然张传未见提及。书中提及《胡传》的一次（第9篇），《左传》两次（第9第14篇），《穀梁传》二次，其中一次没有明提（第14篇，第31篇只作“传曰”）。《公羊传》未见提及。

公然以中华之礼，行乎望国。”整个问题看来复杂。刘基此篇的破题说：“外夷猾夏，而中国失御侮之道，故外夷遂强，而用中国之礼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机也。”这里，刘基没有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相反，夷狄而用中国之礼，正是中国衰败之始。因为这代表了中国不能自守其礼，中国之礼反被外夷用来渗入中国。刘基认为，“越椒来聘，公然以中华之礼，行乎望国。观其以玉帛而来，固异乎执干戈以从事，推原其心，岂诚知义而为之者哉？不过借此以为窥觐之计耳。”楚国之“华化”，只是不怀好意的表面工夫。认为此事足以证明刘基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来忽略了刘基的这个重要判断。

刘基此篇此处所说的，可以看作是对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中论此事时完全顺从胡《传》的修正。刘基在《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题目：《荆人来聘，时楚屈完来盟于师，时楚使宜申来献捷，时楚使椒来聘》）的结尾，阐释题目最后一事“楚使椒来聘”事情的书法寓意时说：

盟宋以后，楚使不通于鲁者十又四年，至文九年之使椒来聘，则楚人之再聘于鲁也。是役也，视夫来聘于庄者（庄公二十三年，题目第一事）无以异，较之献捷于僖者（僖公二十三年，题目第三事）为不同。于是爵其君而名其臣，遂与中国无以异，则进之而又进也。

在结尾又说：

盟宋之役（此题第三事），晋楚之从，始交相见，而玉帛之使，反自曲阜达诸鄆郢之都矣。襄三十年蒍罢来聘，以报鲁侯之朝，回视向日越椒之不书氏者，又何如耶？读经至此，太息而止。

在这篇会试的经义卷中，刘基清楚认为，《春秋》对于“楚【子】使椒来聘”此事，是嘉许的。但在《春秋明经》中，他的看法有所不同。这里，他在结尾说：

或曰：“来聘之举，《传》谓与之，今子之云，得无异乎？”曰：“君臣并书，固与之也，而寢强之意见焉。不然，何以从此而凡役得书爵耶？愚请为之说曰：滕子来朝，自是而皆称子，若曰滕之沦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来聘，自是而得称子，若曰楚之进于中国，自聘鲁始也。吁！圣人之旨微矣哉？”

刘基这里说的《传》，指《谷梁传》和《胡传》而言。《谷梁传》说此事可见“以其来我，褒之也。”《左传》和《公羊传》都没有这个意思，唐朝的陆淳也不以为然，《胡传》则整体上认为是“进之”的。但刘基的议论角度独特，他认为此事的书法在表示楚之“寢强”，显示圣人对于楚人此举，并非真的“与之”。

《春秋》中的华夷问题，其实只是说的两种对立政治实体的认同问题。《春秋》是有立场的著作，作者是从“周礼”和“鲁国”的立场说话和评论的，而企图阐发的却是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所以存在矛盾而难以清楚说明。基本上，当时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主方国家和客方国家。主方国家是周朝、鲁国以及周初封建的其它列国。客方国家则是四裔以及像吴楚这样由夏变夷的国家。主方国家是有政治正统和优越文化的，至少“圣人”是作如是观的。主客自然有内外之别。“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条件，不是单纯的进入，而是心悦诚服地的加入主方的中国，心悦诚服就得不用诈力。《春秋》所以始终要内夏外夷，原因就外夷始终都是以诈以力和中国交往，没有诚服于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刘基始终主张内夏外夷，原因也在于此。这原因却与种族没有过多和主要关系，《春秋明经》中的议论因此也不会有明显冒犯蒙古元朝之处。

（责任编辑 俞美玉）